

欧洲共产主义的 危机

〔西班牙〕曼·阿斯卡拉特著

陈燕 吴丽译 刘文校



東方出版社

欧洲共产主义的 危 机

〔西班牙〕曼·阿斯卡拉特著

陈燕 吴丽译 刘文校

東方出版社

封面设计：苏彦斌

Manuel Azcaráte

CRISIS DEL EUROCOMUNISMO

Editorial Argos Vergara, S.A., Barcelona 1982

根据巴塞罗纳阿尔戈斯·维尔加拉出版有限公司 1982 年版译出

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OUZHOU GONGCHANZHUYI DE WEIJI

〔西班牙〕曼·阿斯卡拉特著

陈燕 吴丽译

刘文校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787×1092/32 13.75 印张 276,000 字 0,001—4,450 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书号 3453·3 定价 2.25 元（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原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西共理论刊物《我们的旗帜》社长，西共党内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负责西共的国际工作，后因同原西共总书记卡里略在如何贯彻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以及党内民主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于一九八一年底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于是写了这本书。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革新派同卡里略为首的西共领导机构分歧的由来，同时对苏联国家的性质、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的根源、共产主义运动同社会运动的关系、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同党内垂直领导结构的矛盾等一些重大问题阐明了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欧洲共产党内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全文译出，供研究参考。

前 言

1981年11月12日清晨我才回到家里。我同其他五个同志一起刚刚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前天，巴斯克的四个同志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我脑子里老在转着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到底怎么了？我已经65岁了，从17岁起我就参加了共产党。我一生都把党的工作作为我的专业。昨天我还在党内很负责的岗位上工作，而现在我却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办，那就是回到我在西班牙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去收拾我的私人文件和书籍，然后回家。

为什么在我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的决裂？我随即十分清楚地觉察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只是个人私事，它牵连和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也因此在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之后的这几个小时里，我下定决心：必须把事情弄明白和讲清楚。

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已经弄明白了，尤其是西班牙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同更广泛范围内欧洲共产主义遇到的危机的关系。我在开始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它同苏联的作用、现实社会主义的作用、国家的危机、密特朗的经验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争论联系在一起。我试图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探索这些

问题。但是，我的这些思索必须完全是敞开的，尚待充实的。

除此之外，我也有必要让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公众舆论了解导致我被开除的整个过程的具体经历。这些经历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则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写这本书是我为了向自己和其他人解释所发生的一切而作的努力的结果。在我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最后一段时期，我十分坚持西班牙共产党有必要成为一个开诚布公的党和进行开诚布公的争论。今天我愿为这种开诚布公作出贡献。

我是根据我的观点和我的笔记写的。我无意要表现自己是公正的。我写的是我亲眼见到的事情。我也可能犯错误：个人的，从而也是片面的看法总是有这种危险性的。但我可以保证一点，即我是诚恳的，我对书中写到的一切都是深信不疑的。

这本书还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讲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当然，要是时间富裕些，并且按历史学家的“精确性”来要求，那么也许还可以引用更多的资料和搞得更确切些。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是我对一系列问题的回忆和思考。这些思考是从1980、1981年就开始的，甚至还要早一些，其中有些想法是我在写书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某些问题上修正了我过去的看法。我力求把我的思想变化过程清清楚楚地叙述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同广大共产党人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再推而广之，则也是同左翼中许多人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整个脑海里占很大位置的是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想法，是我亲身经历中的体会。这些体会能使人充实起来，但有

一个条件，就是要意识到这些体会同时也包含着使人墨守成规、老是往后看、缩手缩脚的巨大危险。我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首先应该归功于在《我们的旗帜》^①编委会中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以及其他的革新派共产党人小组。他们帮助我用更为切合现实和放眼于未来的见地来研究事物。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① 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刊物。——译者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矛盾的由起

第一章 1980年的休假	3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上出现的裂痕	8
第三章 初步回顾我同卡里略的关系	14
第四章 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 荒谬态度	19

第二部分 西班牙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

第一章 今天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	37
第二章 西班牙共产党漫长的独立道路	46
第三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52
第四章 要列宁主义,不要列宁主义	61
第五章 1974年苏联对我的攻击	71
第六章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对 “现实社会主义”的态度	78
第七章 “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90

第三部分 走向十大的复杂道路

第一章	现实与挫折	101
第二章	我们做错了什么	106
第三章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	118
第四章	害怕发表会议纪录	132
第五章	行不通的两分法	137
第六章	“二·二三”政变和国家危机	147
第七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回答	157
第八章	党内危机的加剧	168
第九章	知识分子为什么退党	179
第十章	《我们的旗帜》和所谓的 革新派“小集团”	198

第四部分 处在危机中的大会

第一章	密特朗和欧洲左翼	231
第二章	有可能建立一个欧洲 共产主义的党吗?	245
第三章	革新	271
第四章	克维多影院发生的意外事件	277
第五章	朝着旧式党发展	283

第五部分 开 除

第一章	权力重新集中在书记处	299
第二章	我离开了《我们的旗帜》	307

第 三 章	巴斯克问题:对新事物视而不见.....	310
第 四 章	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在马德里 发表演说	326
第 五 章	开除十个人,先四个后六个	332
第 六 章	执行纪律和党的解体	352

第六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附件一	西班牙共产党前律师基层委员会致 第一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 术家代表大会的通知.....	389
二	争取建立革新的欧洲共产主义.....	394
三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在中央委员 会 1981 年 9 月 25 日会议上的讲话	401
四	对西共十大第七部分决议全文的 修正案.....	407
五	西共十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	426

第一 部 分

矛 盾 的 由 起

第一章

1980 年的休假

我 1980 年的休假是从桑坦德大学暑期班开始的。我和妻子驾车先到桑蒂亚娜德尔马尔耽了一天一夜。我们不光赞叹那如画的建筑,并且在一种由住家和宫殿、小巷、广场和庭院异常协调地组合在一起的气氛中漫步,“体会生活的乐趣”,在美的享受中交杂着脱离现实生活而沉浸在十七、十八世纪城市中的奇异感受。我对妻子埃斯特尔说:“这种感受同我一个半月前在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古代威尼斯人称之为拉古萨的地方漫步时一样。”……现在很少城市能够如此使人感到身处艺术和历史包围的气氛之中。

我在大学生们一片“嘈杂喧闹”中到了桑坦德的马格达莱纳宫殿。可以说,在那里所有的科目,什么绘画、文学、园艺、兽医、生物、政治、神学……统统都几乎同时研究和讲授。我讲的是国际问题,题目是:《欧洲和地中海》。同一天,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①在那里讲工会的作用。看上去好象是一次

① 现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原为工人委员会负责人,西班牙共产党十大时当选为总书记,1982年曾因同当时的总书记卡里略发生矛盾而自动辞职。在卡里略辞去总书记后,他复于1983年底在西班牙共产党十一大时当选为总书记。——译注

题材广泛、思想丰富的“共产党宣讲日”。其实不然，那天讲学的还有费尔南多·萨瓦特，安东尼奥·德塞尼洛萨，里卡多·古略翁和米盖尔·科尔德罗（他是我1977年在莱昂省的竞选运动中结识的）。当然更不用说这些讲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劳尔·莫罗多，安赫尔·比尼亚斯和曼努埃尔·梅迪纳。^①

从桑坦德到加泰罗尼亚，一路平安无事，唯一的意外是比预计早到了半天，尽管我是本着“不着急”的念头开车的，但是高速公路的活力逼着我快速往前开。我们准备8月份在埃布罗三角洲交界处的安波利亚海滩同我女儿卡门和外孙选戈一起度过。

我准备一离开桑坦德，就彻底休息。这样安排是一反我以往的习惯的，我不想为制订什么长期计划伤脑筋，既不想为《我们的旗帜》写文章，也不打算为可能出版的书写短文或章节。我既没带笔记本，也没带我常常用来口授的磁带录音机。我只带了几本历史书看看，一本是利奥波德·博伊西尔、多伊彻和卡尔合著的《异教邪说的终结》，还有一本是艾瑞迪编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册。

在假期的头几天，我心情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抛开所有的具体计划来思考些问题。

前几个月，我参加了一连串的国际性会议。5月在罗马参加了一次有关东西方关系的讨论会，参加的有欧洲左翼的一些知名人士，如英国工党议员斯图尔特·霍兰德，西德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布鲁诺·弗里德里希，意大利社会党议员隆巴

① 上面例举的都是西班牙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各党派都有。——译注

迪,鲁福洛和西尼奥里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普隆杜,意大利共产党议员吉安·卡洛·巴叶塔,乔治·纳波利塔诺和罗马诺·莱达,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德布鲁韦尔,美国代表中有比亚勒教授,威廉·格里菲斯和原基辛格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助手索南费尔德。我们在罗马附近一家旅馆里的讨论中明确地谈到里根获胜的具体威胁,美国更趋强硬的前景,缓和的告终以及军备竞赛的重新开始。

一个月之后,我在杜布罗夫尼克参加了南斯拉夫组织的一次关于地中海问题的“圆桌会议”。我在那次会上同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际关系负责人格雷梅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格雷梅斯以“西班牙劳动人民利益”为论据反对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十分凑巧,接下去就轮到我发言。我事先来不及准备怎么回答他。我首先对他作为法国共产党人居然表达西班牙工人的利益表示感谢。我对他说,为了礼尚往来,也许我应该象他一样,以法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名义来反对法国共产党的立场,这样下去,事情又会到什么地步呢?在我结束发言时,我奉劝他最好还是注意反对沙文主义倾向,因为近日来就是这种倾向驱使法国农业主袭击和焚毁西班牙运载水果和蔬菜的卡车。……会后在走廊上格雷梅斯称我为“挑衅分子”,但是他不敢在正式会议上答复我。他没等开完会,前一天就回巴黎去了。

不过,这只是件区区小事。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另一种情况,特别是在会议期间我同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交谈中证实了这种情况,就是在苏联的作为中,大国政策、霸权政策日益明显地、甚至明目张胆地占了主导地位。这一政策导

致它入侵阿富汗，并且还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从前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从阿富汗事件以来，我在思想上愈来愈肯定一点，即苏联的军人在国际问题的决策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的国家政策是通过对其他各国共产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把它们当工具利用的办法来实现的，在这方面法国的例子最为明显。我们能抗得住这种压力吗？我们能真正在西欧确立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坚持反对集团政策、争取解散军事集团、开创和平主义的、进步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思潮吗？反对帝国主义是可以的，但是也能反对莫斯科的霸权主义吗？面对法国共产党亲苏的宗派主义，我们又如何来表明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呢？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家的力量够么？尤其糟糕的是西班牙没有参加欧洲议会，使我们脱离了有可能着手制订“欧洲左翼”前景的一个中心。

我在杜布罗夫尼克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关系负责人吉安·卡洛·巴叶塔谈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巴叶塔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脸部反映出他有长期斗争的经历，但是他的笑容却永远是年轻的。他象所有的意大利人那样表情丰富，话尤其多。他自己承认说：“我只要高兴讲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就可以使谈判失败，或者使自己在选举中丢票……”。不久前，苏联报刊发表了攻击他的文章。他情绪十分激动，反应之强烈使我惊讶。他即将去苏联“度假”，他要“强迫”苏联人撤销对他的批评。我开玩笑说，想必他在那里会无聊得要命。实际上这个例子证明我的一种忧虑，即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尽管吉安·卡洛比我年纪要大得多）之

间,即使是在内部和个人之间要想采取真正独立的立场、毫无拘束地批评苏联是如此之难。这是因为多少年来人们相信(其形式无疑同宗教信仰相似)那里有更为公正、更为自由的新文明。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和反希特勒主义战争中的作用,使这种信仰得到加强。在革命斗争最艰巨的年代,也许这种信念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促使人们临危不惧和勇于牺牲。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1947年从切身体会中就发现并指责了斯大林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他们确实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榜样。1980年6月在杜布罗夫尼克进行的交谈,尤其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国际关系负责人亚历山德罗·格里切柯夫的交谈,使我能再次有机会欣赏他的才干和洞察力。在谈到欧洲、中东和地中海问题时,他的分析是多么精辟,能洞悉现实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他冷静地斟酌各种可能的假设,包括危险性最大的假设。当时有些问题已经很尖锐,例如,如何使性质复杂的不结盟运动(参加的国家有右的,有左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都很不同)避免由于受到华盛顿和莫斯科为首的军事集团愈来愈大的压力而破裂。

然而,当我每天早晨在卡拉马利亚海滩、卡普罗伊格海滩和尤卡利普托斯海滩无止境地洗海水浴时,当我在傍晚看书读报时,或当我在埃布罗三角洲的稻田间散步闻着稻子开始结穗时散发出的酸甜酸甜的香味时,在我脑子里盘旋得最多的并不是罗马和杜布罗夫尼克的那些讨论会,而是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假期前夕在马德里为准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举行的会议的情况。